

中越古代书籍交流考述

刘 玉 璩

越南是受汉文化浸润最深的中国邻国之一。古代越南与中国的历史是融为一体的,从秦末赵陀建立南越政权至公元 968 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此间的一千多年里,越南曾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存在;尽管此后越南进入了自主时代,但是以推行汉文化为实质的科举制度却从公元 1075 年持续到 1918 年;秦汉时期,汉语文教育就开始在南越开展,严可均《全宋文》卷六三所收释道高、法明《答李交州森难佛不见形》等文是现存最早的越南文献;《全唐文》卷四四六收录了越南第一位进士——爱州人姜公辅所著的《白云照春海赋》、《对直言极谏策》。以上均能表明汉文化对越南文化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而这种影响往往通过书籍的传播才得以实现。因此本文拟考察书籍交流这一文化活动,透视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及其向本土的回流。

一、汉籍向越南传播的轨迹与形式

中越两国的政治关系、经济文化交流等客观条件的变化均直接影响书籍的传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籍向越南传播的渠道与形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按中越历史政治关系发展的时代先后顺序探讨如下:

(一)北属郡县时期

在越南作为中国行政区域的北属时期,在现存的各类典籍中难以寻觅关于中越书籍交流的明确记载。通过对间接材料的分析,可推知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官方推行儒学教育及人口的自然流动两种方式传入越南。

秦末,南海郡尉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 207 年建立南越政权。从此以教化民众为目的,开始在越南推行儒学教育。黎嵩《越鉴通考总论》记载赵陀:“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诗经》与《尚书》等儒学典籍在当时已传入了南越。汉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武帝灭南越,把原南越所辖之地划为九郡,其中包括今属越南领土的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儒学教育在三个郡县中继续深入开展,典籍多有记载:

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后汉书·任延传》)

巴蜀越嵩,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论衡·恢国》)

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吴书·薛综传》)
“建立学校,导之经义”必须以书籍为文化活动基础,可以想见当时必有相当数量的儒学典籍在越南流播。

三国时代的士燮曾任交趾太守,《殊域周咨录·安南》云其:“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士燮本人精于儒家经典,《吴书·士燮传》云: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彧书曰:“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官事小阙,辄玩习书传,《春秋左氏传》尤简练精微,吾数以咨问传中诸疑,皆有师说,意思甚密。又《尚书》兼通古今,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

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经过历代地方长官的大力推行，儒家文化与礼乐文明逐渐浸润到越南社会深处，儒家经典也就成为越南文化之渊藪。为此越南史学家吴士连对士燮的功德作了高度的评价：“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土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①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紧密相连，中越之间人口的流动非常频繁。这种人口流动主要有两种情形最为常见，一是罪人的流放，《吴书·虞翻传》云：“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而据两《唐书》记载安南是唐代岭南流人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二是躲避战乱。尤其是王莽之乱使得许多士人避地交州。如：

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者。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理惑论》）

许慈字仁笃，南阳人也。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建安中，与许靖等俱自交州入蜀。（《蜀书·许慈传》）

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吴书·程秉传》）
这些学者士人长期生活于交州，汉籍必然随着他们文化活动的开展而传播至越南。梁代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三国时释康僧会，家居交趾，却能“明解三藏，博览六经，天文图纬，多所综涉”，可资佐证。

（二）独立自主及法属时期

开宝八年（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交趾郡王，从此越南历代都对中国的封建王朝“修臣行礼”，中越两国建立起长达近千年的宗

藩关系。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变,汉籍向越南传播也呈现出新特点。越南使臣在中越书籍交流中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越南自称为文献之邦,士大夫们都喜爱书籍,充分利用每一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购买书籍。《宋史·安南传》曰:“大观初,贡使至京,乞市书籍。有司言不许,诏嘉其慕义。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外,余书许买。”除了购买之外,使臣还以越南土特产交换汉籍。《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九记载天顺元年(1457)六月,安南陪臣黎文老奏曰:“诗书所以淑人心,药石所以寿人命,本国自古以来每资中国书籍、药材以明道理,以跻寿域。今乞循旧习,以带来土产香味等物易其所无,回国资用。从之。”使臣购买汉籍,在越南文学作品中亦有反映。胡朝范汝翼《郭州判官回京送冠带、书帙、药材走笔谢之》一诗云:“去年夏首送夫君,邂逅相逢今早春。羽节踏残南岭瘴,单衣带得北京尘。”^②从诗题和诗中“南岭”、“北京”等语词可以知道诗人之友出使北京回国,带回书籍、药材等物品送与诗人。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安南》记述了黎朝使臣的购书之习:“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编买经传诸书。”

使臣出使中国除了履行贡职,有时还肩负着购买官书的任务。阮朝大臣汝伯立于明命癸巳年(1823)与嗣德十年(1857)两次出使中国,他的北使诗文集《粤行杂草》收录了他出使中所作的诗歌及见闻录,其中“书目”一条曰:

余在广东购买官书,每访书庸,见环城者二十余。皆堆积书籍,重架叠级,不知数,问其名目,则彼客各以本庸书目示,皆至一二千余名。间经数月拣购,惟筠清行为多。

阮朝嗣德贡使阮述也曾两次北使,他的《往津日记》记述了他第二次来华的见闻与经历。日记从嗣德三十五年(1882)十二月八日始,止于嗣德三十六年(1883)十二月廿九日。短短的一年中,阮述在公干之余多次走访书店。如下:

(嗣德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至文裕堂买书。

(嗣德三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是晚至五云楼买书,楼已失火,移居他店,书籍亦多残缺。

(三月)初六日,至见得斋书店,见有揭卖名人字迹。余乃买李中堂、李文田所书楹联二对携归。

(九月)初九日重阳节,在馆闷甚。乃与杜富肃步至书画舫,又至官书局,买书数本而回。

(十一月)初九日,至扫叶书房买书。

越使的爱书购书同时反映在中国官员的著作中。同治戊辰(1868)秋,越南遣其使臣黎峻、阮思僩、黄竝等八人人清进贡。清马先登著有《护送越南贡使日记》,其序云:“乃其陪臣等,亦复文雅好学,贯京师书籍满二十簏以归。”

由于两国间的宗藩关系,作为宗主国的中国政府颁赐书籍,成为这一时期汉籍传播越南的又一新途径。除了历年照例颁赐历书以外,中国政府向越南赐书始于景德二年(1005)。黎则《安南志略》卷十一载是年“赐安南郡王黎桓应大藏经,从其请也。”据考此后宋朝向越南赐书不绝,如下:

景德四年(1007)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宋史·真宗本纪》)^③

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公蕴遣使贺祀汾阴后土,又表乞大藏经及御札八体书法,从之。仍以大藏经、太宗御书一百轴,降诏书赐之。(《安南志略》卷十二及《越峤书》卷四)

大中祥符七年(1014)秋八月,公蕴贡方物,仍求赐介冑及大藏经,从之。(同上)

李太祖顺天九年(1018)夏六月,遣员外郎阮道清、范鹤如等如宋,表求三藏经,宋帝许之。及还,诏僧费智往广西迎之,置于大兴藏。(《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④

李太宗通瑞元年(1034)秋八月,遣员外郎何授、杜宽等遣

驯象于宋,宋以大藏经答之。(《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二)以上宋代向越南赐大藏经共计六次。可惜元世祖至元时,镇南王伐安南,诸藏尽毁于战火。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安南世子陈日燭上书请求再次颁赐大藏经,元中书奉诏赐经。^⑤

明清时期,所赐之书种类增多。明代的赐书以儒书为主。《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记载黎太祖“己亥(1419)春二月,明遣监生唐义颁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阴鹭》、《孝顺事实》等书于府州县儒学,俾僧学传佛经于僧道司。”《明太宗实录》卷二四九则记载永乐二十年(1422)五月,“交趾宣化、太原、镇蛮、奉化、清化、新安等府及所隶州县学师生贡方物诣阙,谢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为善阳鹭》等书。”清代的赐书均为御定小学用书。清徐延旭《越南世系沿革略》云:“黎维祉子孙逃居老挝深山中时,思聚众复国,即今所谓黎王后也。……自鄙其国文教之陋,奏请颁发《康熙字典》,许之。”徐氏《越南辑略》卷一“赐予”曰:“雍正三年(1725)安南国人贡,特赐国王‘日南世祚’四字,《古文渊鉴》、《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各一部。”

综上所述,在越南的北属时期,汉籍传播的种类较为单一,大多为配合地方统治者以儒术教民及士人治学之用的儒家经典。而在独立自主及法属时期,越南使臣通过北使对外交流的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实际需要,或受中国文坛风尚的影响,自如地选择各种书籍购买,因此儒学之外的书籍也随之传入越南。例如明宋濂曾以文而名噪一时,“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⑥另外前文提及的《粤行杂草》一书,卷末附有汝伯立抄录的筠清行经营的书籍目录,这份目录共载有1672种书籍,遍及经史子集四部,而当时类似于筠清行的书庸,“见环城者二十余”。^⑦从此目录所载书籍的种类与书庸的数量,可以推想汝伯立所能购买的书相当丰富。

二、越南汉喃书籍在中国的流播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汉籍传入越南后,对越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古代越南铜鼓铭文和西汉南越王墓、广东南山南越古冢的出土物来看,早在公元前南越就已经使用汉语篆字。^⑧古代越南与朝鲜、日本一样,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汉语文的流传和应用,在汉字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模仿汉字会意、假借、形声等造字方法,用汉文字形来拼写越语语音的新文字,即“喃字”,又称“字喃”。汉字和喃字在越南均有悠久的历史,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现代拉丁越南文才成为越南的法定文字,逐步取代汉文与喃文。所以在越南产生了一大批汉喃文古籍,这些书籍也通过不同的途径流向中国。

与日本、韩国相比,流播于中国的越南古籍规模与数量都很小,相关历史记载也不多见。越南现存的汉喃古籍主要为后黎朝至阮朝(1533-1945)时期的典籍,此前的典籍大多毁于战火。据史记载,越南古籍也曾通过官方途径进入中国。明李文凤《越峤书》卷五云:“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春二月,孟甲自安南还,陈光晟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陈奉公、员外郎诸卫、寄班阮琛、员外郎阮演诣阙献书。”但此事《元史》及越史均无记载。按《新元史·世祖本纪》云,至元二十一年(1284)鄂州达鲁花赤、赵翥等赴安南收取“《天文图讖》、《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監历》”等书。但这只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并非搜访辑佚之举。而据越史记载明代中国曾专门派人去越南搜求书籍。^⑨《大越史记全书·黎太祖纪》曰:“戊戌[明永乐十六年(1418)]秋七月,明遣行人夏清、进士夏时来取我国古今事迹志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十三黎平定王二年(1419)条亦云:“凡我国从陈以前事迹志书收送金陵。”但是明代的官方目录《文渊阁书目》,仅收录《大越史略》一部二册,未见有其它的事迹志书。

通过考察中国公私所藏的安南本书籍,结合中越关系史料的分析,可以明确越南汉喃古籍至少曾通过使节对外交流、商业贸易、民间互往三种方式传入中国。

越南贡使不仅对中国书籍传播于越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带来越南书籍。流传途径可考、并在中国流传较广的越南典籍首推阮朝皇子绵审及其弟绵寅、大臣张登桂的作品集。经查国家图书馆藏有绵审《仓山诗稿》抄本、绵寅《苇野合集》嗣德乙亥年(1875)刊本、张登桂《张广溪先生诗集》抄本;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有《广溪诗集仓山奏版合编》五卷四册,为成泰十六年(1904)刊本;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影印的泰山丛书中,有《仓山诗集》一书。据考,上述三人的作品集常被当作外交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文士,是中越士人文化交流的媒介。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越南人贡,贾臻曾任接送越南贡使之职,其《接护越南贡使日记》记录是年七月初三日越南陪臣枚德常“赠句留别,并以该国从国公阮勉(绵)审诗词各集求正。”阮述《往津日记》也多次提及将三人的作品集赠与中国士人。如下:

(嗣德三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使随员递书籍。(原文注:仓山、苇野、妙莲、张广溪诗文诸集。)

(嗣德三十七年三月)廿一日,以《苇野诗文合集》送赠梅小树。

(四月)初四日,以《苇野诗文合集》送赠周观察。

同治辛未(1871)年马先登曾再次接送越南贡使,著有《再送越南贡使日记》,在这次接送中,读到了张登桂的作品,摘录其《越史应制诗》作为日记的附录,并在日记中加以说明:“嗣德十年(1857),直学士张登桂延芳氏,刻有《广溪诗集》四卷。卷首列明命十七年(1836)潘清兰梁溪、绵审仓山两序,集内有《读越史应制》五古一首。于其国之建置嬗代,言之甚详,摘录编末。以为闻所未闻者闻,见所未见者见。”

三人中又以绵审的作品集最负赞誉。清季著名词家谭献著《篋中词》，选录了绵审的作品；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云：“绵审号白眉子，有《鼓柁词》一卷。咸丰四年（1854），越使过粤，遂传入华，善化梁莘畬在粤督幕，曾录存之。”据饶宗颐考订况周颐推重绵审，是受其同乡龙启瑞的影响。^⑨龙氏《汉南春柳词》有“庆清朝”序云：“今年冬，越南贡使道出武昌，其副使王有光以使国大臣诗集来献，且求删订。余以试事有期，未之暇，略展阅数卷而封还之。其中有越国公绵审及潘併，诗笔之妙，不减唐人。”显然，中土文人皆因越南贡使相传才得以见绵审之作。

有些越南古籍通过使臣传入中国后，被中国文士重新翻刻。同治十年（1871）越南翰林院学士阮有立奉使通贡道经长沙，邂逅湘阴李辅耀，而诵之其从父阮淡如的《史论》，此书为集十三经之句而作的论史之著。后经长沙徐树铭、王闿运、湘阴李桓作序，由李氏于同治十三年（1874）刊刻。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越南反法爱国志士阮尚贤《南枝集》。据此书的序跋可知，1882年法国将攻越南北圻，阮尚贤曾奉嗣德皇帝之命如清请求援助。后章炳麟避难于江户，与阮尚贤的亡国之痛相若，为《南枝集》的中国刊印本撰序于1913年。

商业贸易是越南古籍传入中国的另一重要途径。从唐代开始，中土与交州就开始了贸易往来，但史籍鲜有关于中越书籍贸易的详细记载，根据中国现存越南书籍的印章、题字等，依然能略知一二。在全国各大公共图书馆中，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越南古籍最多，其中大多数安南本古籍钤有“会安叶同源”朱印，朱印的形式各异，或配以拉丁越南文，或另加上“发货图章余事不同”、“经售”等字样。其中维新壬子秋（1912）河内柳文堂刊刻的阮德述《越史剩评》，所钤的朱印在“会安叶同源号”诸字下，另有“西药新书绸缎金漆什货”十字。可见叶同源是一家经营物品丰富的商号，除书籍之外，还经营药品、绸缎等杂货。会安又作“惠安”，旧时会安港是地区性的

国际化商港,尤以华商来此贸易者最多。清澎湖禀生蔡廷兰因参加科考遭遇飓风,漂泊至越南,死里逃生后,将其经历写成《海南杂著》一书。其书《炎荒纪程》记述越南见闻:“又百六十抵广南省城(原注:俗称惠安,其省城称坐葵城),宿庸长洪锭舍(福建同安人)。去城二十里为惠安庸(中国人最多)。”惠安是越南华侨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又以福建籍华侨最多,如今的越南惠安古城建筑风格、风土人情、服饰装扮与中国福建惠安相似。可以推测“叶同源”应是一家由华侨开设的商号,书籍上朱印的形式各异,说明叶同源有不少分号,越南的商品包括书籍则通过这样的商号销往中国。

越南古籍除了经商号输入到中国外,还通过广东的刻坊而传入。国家图书馆藏有两种在中国刊刻的越南古籍——《皇越地輿志》与《南圻六省地輿志》。两种古籍均由越南居士惟明氏1872年付梓刻印。按,惟明氏原名陈光光,越南南方安平村人。《皇越地輿志》作者不详,成书于明命十四年(1833),《南圻六省地輿志》由惟明氏所编。《皇越地輿志》牌记题“粤东佛山福禄大街金玉楼藏板”,并有“一在提岸和源盛发客”字样,可知此书由广东金玉楼刻印后,通过南圻堤岸的“和源盛”商号发往越南各地销售。《南圻六省地輿志》牌记虽没有署印堂名号,但两书均在同一时间刻印,纸张、版式相似,书名页均钤有形式相仿的一圆一方两阳刻朱印,圆印为图案,方印有“姑苏原本”四字,可以推知这两种古籍应是在同一地点刻印。另外,《南圻六省地輿志》书名页条记署有“在提岸大市广盛南发客”诸字,一至三页版心下方竖刻“在提岸大市和源盛发客”,表明此书与《皇越地輿志》有相同的流通渠道。

惟明氏《皇越地輿志》序言云:“皇越地輿之书,世所珍藏,未易经见也。予尝慕是书而无由及见时。幸有大富浪沙国官庐公,笃好南朝书籍,自北圻购买得之回以示予。”此书原本从越南获得,惟明氏却将其在广东翻刻,与当时交广之间繁荣的商业贸易是密切相

关的。这两种在中国刊刻的越南古籍,与其他中越古籍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牌记刊刻时间仅采用干支纪年而不用当朝年号,此举可以方便在两国同时销售。据实地访查,除上述两书外,至少还有如下越南书籍曾由中国刻坊刊印过:

1.《如西日程》,以喃文七七六八体形式撰写的欧洲旅程日记。张明记(号梅庵,字世载)撰并序于成泰元年(1889),广东佛山镇天宝楼印于庚寅年(1890)。

2.《金龙赤凤全集》,越南叭剧作品合集。今存抄本据广东盛南印本所抄。

3.《白猿新传》,关于白猿和尊各的六八体喃诗传。有粤东佛山镇天宝楼印本。

4.《大南实录正编》,景兴、嘉隆间的编年史。惟明氏考正,法国参辨芦嘉陵序,粤东金玉楼印于癸酉年(1873)。

5.《仕媿书集》,僧人与仕媿的对话集。阮居贞编撰,惟明氏订正。按,“仕媿”为喃文,意为女居士。佛山镇福祿街金玉楼印于甲戌年(1874)。

6.《陈诈婚演歌》,关于陈玉容与楚帝丞龙诈婚故事的三回剧。题凤油里人明章订正,明章即惟明氏。此书今存印本两种,一本粤东佛镇宝华阁印于癸巳(1893)年;一本粤东英文堂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7.《李公新传》,关于李公故事的六八体诗传。有粤东寺林书局1876年印本与粤东荣和园1876年印本。

8.《李公新书》,明章氏订正,题“福祿大街天宝楼书局出版”。

9.《观音演歌新传》,书名页题“丙申年(1896)新刊,宝华阁藏板”。

10.《赵五娘新书》,书名页题“丁亥年(1887)新刊,凤油里明章号订正,广盛南发售、宝华阁藏板”。

11.《昭君贡胡书》,又名《昭君贡胡传》,关于昭君的六八体喃

诗传。惟明氏撰，有粤东佛山镇近文堂乙亥年(1875)印本与天宝楼乙酉年(1885)印本。

12.《金云翘新传》，阮攸所作《金云翘》六八体喃诗传。有粤东文源堂印本。

13.《丁刘秀演歌》，喃文叭剧《丁刘秀》。佛镇宝华阁光绪二十年(1894)印本。

14.《小山后演歌》，喃文叭剧《小山后》。明章氏订正，佛镇宝华阁光绪甲午年(1894)新刊。

15.《云仙古迹新传》，又名《陆云仙传》、《云仙传》。嘉定惟明氏订正，有佛镇金玉楼甲戌年(1874)刊本、粤东陈村永和源庚辰岁(1880)刊本、佛镇盛南棧刊本、佛镇字林书局刊本。

中越两国深厚的文化与政治关系，及地理位置上唇齿相依，使得两国有极为密切的民间互往。以下事实皆能说明：中国京族的原居住地即为越南；历代都有大量华侨定居于越南，据张秀民《安南王朝多为华裔创建考》考证越南前黎、李、陈、胡、莫五朝开朝皇帝均为华裔。而民间互往必然也会使得一部分越南古籍得以流传中国，尽管它们数量微小。在国家图书馆笔者曾见到两种特殊的越南古籍。一为黄高启撰，陈赞平所译的《越史镜》，此书为越南维新三年(1909)刻本。书护页上有原书主题字：“此书得□安南会安，由许憾予同往购得。”另一书为黄道成编写的《越史新约》，刊于成泰丙午年仲冬。上卷的书衣帖有一红纸，上题“奉赠赖以仁先生作为考察经过历史，侨越双溪张能道。”可见这两种书的传入皆是中越民间友好往来的结果。

三、结语

中越书籍的交流在规模上远远不能与日本、韩国同日而语，但是却依然能反映汉文化在两国之间的传承。一些重要书籍的流传不仅是中越文化传播史上最为生动的标本，也是学术研究难得的

新材料。

宋陈仲微曾官居兵部侍郎,宋亡后歿于安南。撰有《广王卫王本末》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据《四库全书总目》云:“安南国使携此书入觐,因传于世。”汉文大藏经的刊刻一直倍受文献研究者关注,而安南藏得以刊刻,却依赖于元代所赐藏经的南传。《越史略》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史籍,成书于十四世纪,记录十三世纪以前的越南历史,由越南人所著,著者姓名无从考,在越南一度失传,但传入中国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又经清钱熙祚校订收入守山阁丛书史部,现越南所存抄本皆据中国印本所抄。《安南志略》与《南翁梦录》的流传更是依赖两国的文化交流。《安南志略》是一部越南史志,为越南人黎崱内附元朝时所作,成书于1333年。黎崱字景高,号东山,自称为东晋交州刺史阮敷之后,因过继给舅父而改姓黎。作为一部越南人在中国撰写的史书,《安南志略》既融合了作者耳濡目染的本土知识,又深得中国史学传统,同时又是从远古至元朝这一阶段最早的一部越南史,亦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这部越南史书向越南本土的回流极大地促进了越南历史及中越关系的研究。《南翁梦录》的作者黎澄,为越南胡朝太上皇黎季犛的长子,永乐五年(1407)在与明朝的战争中被俘,后仕至明工部尚书,他追忆安南陈朝旧事佚闻写成此书。目前所知《南翁梦录》最早的刊本为明宋彰正统七年(1442)刻本,已佚,但后被《明人百家小说》、《五朝小说大观》、《皇明逸史》、《续说郭》、《纪录汇编》、《涵芬楼秘笈》、《丛书集成初编》等多种丛书收录,流传颇广。此书也曾回流越南本土,越书《北书载南事》中《南翁梦录》的内容即得之于中国。

中越双方相互保存的书籍,必将促进新一轮的书籍交流,同时也会由此推动学术的新发展。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汉喃研究院,是越南保存汉喃书籍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个研究机构,经过我们的实地走访,汉喃院现存的古籍中有三分之一(1641

种)为中国古籍的越南重抄重印本,另外三分之二为越南人在中国古籍影响下创作的作品。这是一个极大的书籍资源宝库,将会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有待中国学术界去认识和加以利用。

注:

① 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卷首,内阁官板正和十八年(1697)重印本。

② 黎贵惇编订:《全越诗录》卷四,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抄本,编号 A.12621。

③ 潘清简等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一亦载此事曰:“丁未十四年春,遣弟明昶与掌书记黄成雅献白犀于宋,表乞九经及大藏经文,宋帝许之。”

④ 《安南志略》卷十二与《越峤书》卷四亦记有此事云:“天禧二年五月,赐公蕴道藏经,从其请也。”所赐书名有所不同,但未闻当时我国国子监刊刻道藏。《越史略》叙及所赐之书亦作“三藏经”,当从《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⑤ 黎崱:《安南志略》卷六《安南陈表求大藏经》,中华书局,2000年6月。

⑥ 《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宋濂传》3788页,中华书局,1974年4月。

⑦ 河内汉喃研究院现存《粤行杂草》抄本两种,其中248页本下卷附有此目录,编号为 VHv.1792\2。

⑧ 见《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3期;罗迦陵辑《南越文王冢黄肠木刻字》、潘天如藏《南越残璧》,均见《艺术丛编》,广仓学窘民国间刊行。

⑨ 黎贵惇《大越通史·艺文志》、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文籍志》、明铮《越南史略》、陈重金《越南通史》等均认为明朝曾搜刮越南书籍至金陵,致使越南书籍尽毁。经中国学者考证,实为越人讹误。见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401-40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何仟年《越南传入古籍略考》,《文献》2003年第2期。

⑩ 陈荆和编注:《往津日记》卷末《阮荷亭〈往津日记〉钞本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